

款款女帽 風流競放

——昭陵文物中的唐代婦女用帽

／胡元超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共有兩百餘座陪葬墓。自上個世紀七〇年代以來，已先後發掘清理了其中的三十九座陪葬墓，出土各類文物六千餘件。三十九座被發掘清理的墓葬，從建墓的時間上來看，始於貞觀十四年的楊溫墓，止於開元二十六年的李承乾墓，跨度達百年之久。所以這些文物中婦女形象的用帽，可以認為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大唐開國百年間的婦女用帽情形。

簡述一下唐以前我國婦女用帽的起源和發展，對全面瞭解唐時婦女用帽的情形無疑是有幫助的。我國古代

的男子成年後加冠，女子成年後加笄，這在《禮》裏就有明確的規定。《禮·內則》又云：「女子……十有五而笄。」笄即簪，是用來固定髮髻的。冠是帽子的總稱。可見，以漢民族的傳統而言，我國三代時的婦女是不戴帽子的。因為冠和笄從最初使用時，除了實用價值外，還都有表示「成年」身份的功能，所以，它們表示身份等級的功能便伴著歷史的腳步越來越突出。男子以冠表示身份等級，透過花飾、質地、形狀和冠名的不同去區分。婦女以笄表示身份等級，同樣也從這幾個方面著手，如把

笄的後柄做成各種形狀，其中又以鳳形笄為貴，即把笄的後柄做成傳說中瑞鳥鳳的頭形。到了秦時，笄便向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一是演變為首飾，到漢時，已形成完備的首飾制度。《後漢書·輿服志》等史籍對此都有著詳細的記載。這一演變的核心是花釵，花釵是笄的變種，基本上是以花釵的多少定等級。《舊唐書·輿服志》載，唐時一品為九樹，二品為八樹，三品為七樹，四品為六樹，五品為五樹。二是演變成帽子，稱為鳳冠，實質上是把鳳形擴大，吸收男子用帽工藝，製成冠狀。漢制，惟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入廟行禮，方戴此冠。此後，戴鳳冠成為慣例；不過其制多有更革。至明代，九品以上命婦皆可戴鳳冠，就是平民女子，結婚時也可假用九品服，戴鳳冠，相沿至清末。

以上所述我國古代婦女用帽的起源和發展，都是針對婦女著禮服而言的，而且形制變化並不大，且迄今為止還缺乏更多的考古資料。但可以肯定地說，我國唐以前婦女除了在正式場合著鳳冠以外，在非正式場合，也有戴帽的傳統。後唐馬縞在《中華

古今注》中，記述了秦時的婦女在家居生活中戴的一種叫冠子的帽子，其文云：「冠子者，秦始皇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羅為之。」審其文義，可能類似於現在夏天婦女戴的遮陽紗帽，因其形、色俱似芙蓉葉子，故名。果如是，這種帽子當是用竹篾做帽圈，再以碧羅張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起到防曬的作用。自秦以降，對婦女非禮服用帽的記載便逐漸多了起來。昭陵文物中的婦女形象，沒有發現著禮服的，因此，在這篇文章裏，我們也不介紹唐時婦女著禮服時的用帽情形，只談談她們日常家居或出遊時所戴的非禮服用帽，這樣更具有代表意義。

唐代前期婦女所戴的非禮服用帽，總體來講，可分為四種情形：一是繼承舊制，特別是齊隋舊制，著前代婦女已著之帽。二是戴西域或北方少數民族之帽，即所謂胡帽，雜以胡漢服裝，不拘一格。三是戴漢式男帽，與之相配套的服裝又以漢式男裝為主，以少數民族服裝為輔。四是吸收異域服飾文化營養，結合當時風尚，自創用帽。以下結合文物，分而述之。

一、依齊隋舊制——冪離與帷帽

在昭陵陵園已發掘清理的三十九座陪葬墓中，張士貴墓（顯慶二年）、韋貴妃墓（乾封元年）、燕德妃墓（咸亨二年）都出土了頭戴（手捧）冪離或帷帽的婦女形象文物，其中以女騎馬俑居多。

圖一是出土於張士貴墓的彩繪釉陶女騎馬俑。女俑穿窄袖長衫，繫石榴長裙，頭戴冪離。圖二同樣是出土於張士貴墓。女俑的裝束與圖一中的女俑相彷彿，不過二者間所戴的冪離稍有不同。



圖一



圖二

照《舊唐書·輿服志》的說法，冪離乃是「齊隋舊制」，而且最初「發自戎夷」，它的最大特點是能夠「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言其「發自戎夷」，是有充足理由的。《隋書·吐谷渾傳》載：「其主以皂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冪離，婦人裙襦，辮髮，綴以珠貝。」《舊唐書·吐谷渾傳》載：「男子通服長裙繪帽，或戴冪離。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髮繫後，綴以珠貝。」《隋書·附國傳》又載：「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或戴冪離。」可見冪離的確是西北少數民族所

發明的帽子，並且最初是由男子戴用。至於說唐時婦女戴冪離，是「依齊隋舊制」自有淵源可溯。宇文齊政權，最高統治者本是鮮卑塚胤，與吐谷渾同根，吸收吐谷渾人服飾文化，戴用冪離，很是自然。隋的政治體統，又承於齊，故隋人戴冪離，亦有淵源。可是，齊隋時都由婦女戴用，實是當時婦女服飾文化的一大吸收。究其原因，恐怕是魏晉之時，漢人尚清談，重禮儀，婦女出行乘車，施以帷幔，而至齊隋，婦女漸尚騎馬，又不欲使人「途路窺之」，所以戴上了冪離。

唐初，統治者對冪離表示接受，要求婦女騎馬出行時戴用，當然也是考慮到它能夠「全身障蔽」。馬綽在《中華古今注》裏解釋冪離時云：「類今之方巾，全身障蔽，布帛為之。」但是，我們看到圖一和圖二中女俑所戴的冪離，明顯沒有「全身障蔽」，且帽子上部又呈圓鉢形，而圖一中女俑所戴冪離的圓鉢形還有很闊的外沿。其中的原因，我們分二步解釋：女俑所戴的冪離，沒有做成「全身障蔽」，且面部外露，是符合生活實際的。

冪離之布帛中間必有開縫，婦女不欲使人「途路窺之」，則垂下布帛，布縫相交，全身障蔽；如需向外觀看，則將布帛分開，在領下相交後拋，再在頸後束結，這在文物的背面可以看得非常真切。製作陶俑時，工匠必從審美的角度考慮，將布帛做成在頸後束結的情形，以便突出人物面部。至於鉢形，實際是用來固定布帛的，也是西域人「以皮為之，形圓如鉢」帽子的直接應用。可見，當初西域人所戴的冪離，實是把帽子和布帛結合在一起。

因為冪離能夠遮住婦女的面容，所以在隋唐之際，它曾被一些政治家和軍事家所運用，讓勇士戴之，以充婦女，從而進行政治權謀和軍事鬥爭。《資治通鑑》卷一八六載，瓦崗軍領袖李密歸唐後不久，又叛唐東走，欲去河南尋找瓦崗舊部，東山再起，途中謀襲桃林縣。他寫信給桃林縣官，詐稱奉詔還京，請桃林縣官安排其妻妾暫住縣舍，得到應允。於是李密「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冪離，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眾，直趣南山，乘險而

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行軍途中，倉促間居然能夠找到數十頂罽羅，說明這種帽子在隋唐之際的確是相當流行的。

《舊唐書·輿服志》記載初唐婦女刻意追求著裝時的自由：「既不在公庭，而風俗奢靡，綺羅錦繡，隨由所好，上自宮掖，下至匹庶，遞相效仿，貴賤無別。」因為罽羅最初是由高寒地區少數民族所創，追求保暖功用的成份比較大，將婦女的面頰、肩

膀包裹得嚴緊密實，秋冬季節還則罷了，到了春夏，肯定悶熱，又不利於婦女展露花容月貌，和當時婦女追求著裝自由的時代風尚明顯不協調，所以，初唐婦女很快就厭惡了罽羅，而喜歡上另一種更能展現女性美的婦女用帽——帷帽。

圖三是出土於燕德妃墓的壁畫〈女侍圖〉。女侍梳單螺髻，穿窄袖長衫，披披帛，繫長裙，手捧主人戴用的帷帽。這種帽子，形若斗笠，周圍



圖三

垂有黑紗或白紗。關於帷帽的起源，一般認為創於隋代。《事物原始》云：「帷帽創於隋代，永徽中拖裙及頸，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紗全幅綴於油帽或氈笠之前，以障風塵，為遠行之服，蓋本於此。」郭思《畫論》說：「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網。」馬縞云：「席帽本古之圍冒（帷帽）也。男女通服之。四周垂絲網之，施以珠翠，丈夫去飾。」《舊唐書·輿服志》引劉子玄疏文說：「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有。」由以上史料而觀，帷帽應當是隋時婦女吸收西域少數民族長裙帽和繪帽用紗的特點而改製的。

因為帷帽周圍垂紗，婦女戴上它騎馬出行，紗隨風動，美貌隱現其中，憑添了幾分嫵媚，所以初唐婦女剛一用它，馬上遞相仿效，浸成風俗。唐代畫家對婦女戴帷帽的情景就頗感興趣，著名畫家閻立本甚至不顧歷史真實，在創作的〈昭君妃虞圖〉中，就畫著王昭君「戴帷帽以據鞍」（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的動人形象。

初唐婦女戴用帷帽，又對其進行改良，嫌其裙幅太長，索性裁短，只

到頸部，猶如今日所見之面紗。婦女愛美，原是無可厚非，卻惹得唐王朝一場「不快」，認為淺露，有失禮容，甚至下詔禁斷。《唐會要·罽羅》載：「武德初，襲齊隋舊制，婦人多著罽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至永徽以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即漸為淺露矣。龍朔二年，有敕禁斷，初雖暫息，旋又仍舊。」又載：「咸亨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又敕下：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罽羅，曾不乘車，別坐擔子，遞相效仿，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理須禁斷，自後不得更然。」可是，實際情況呢？如此的一紙空文，廣大婦女根本不加理會，「春色滿園關不住」，有美依舊要展現，想戴帷帽時還是要戴帷帽。執政當局既非真要鐵心禁斷，亦只能順水推舟，聽之任之了。

圖二中的這位女侍，手捧的帷帽拖裙較長，這可能是因為它為唐太宗的德妃所用，貴為德妃，有母儀天下之責，追趕時髦，仍有顧忌。起初，有人誤認為它是罽羅，原因是把紗質

的拖裙誤為布帛。這也難怪，因為壁畫作品中的拖裙，畫成細條紋狀，彷彿布帛之折縐。其實只要認真觀察，同時代壁畫作品中對布帛折縐的畫法和細條紋還是有明顯區別的。要說明的是，初唐畫家，在技法上繼承魏晉遺緒，以線條勾勒所畫物件之輪廓，然後平塗裝色，暈染技法掌握得不夠純熟，難以表現紗料的質感，只能畫成細條紋狀。

筆者曾見到新疆某地出土的一件唐代戴帷帽女立俑，帷帽做得精緻小巧，周圍垂紗。新疆氣候乾燥，所以，紗質的東西基本完好地保留了下來。其實，戴帷帽的女俑，在昭陵陵園也多有出土，圖四所反映的女騎馬俑即是其一。這件女騎馬俑出土於韋貴妃墓，女俑梳單螺髻，面容豐腴，上半身呈裸體，且顯得很小，和頭部的比例很不協調。這是因為，這件女俑，原本是戴有帷帽，穿絲織衣服。唐時的工匠，考慮到帷帽上的輕紗，不好用泥塑來表現，索性將女俑的上半身做成裸體，然後再給它們戴上帷帽，穿上絲織衣服。因為年代久遠，墓葬裏比較潮濕，帷帽和絲織衣服都已腐朽，才現出裸體來。

形。依此，部分學者誤以為唐時婦女戴胡帽、露髻馳騁和著丈夫衣服靴衫的情形肇自開元。從昭陵陵園出土的文物來看，這些現象，初唐即有。這說明，出土文物能夠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瞭解文獻。劉肅在《大唐新語》裏說，貞觀時的長安，即有「漢著胡帽，胡著漢帽」的情形。

胡帽為唐代婦女所普遍採用，應該是和胡服被初唐婦女普遍採用同步，這裏邊除了唐代婦女喜歡標新立異的原因外，也與胡服自古就為漢人所喜歡的傳統有著絕大的關係。傳統的漢族服裝，「褒衣博帶，革履高冠」（《舊唐書·輿服志》），適宜於乘輿；而傳統的西方、北方少數民族服裝，「領袖窄小」（《舊唐書·五行志》），適宜於騎射。自南北朝起，由於戰亂不息，漢人為了便於行軍作戰，就特別重視對西方、北方少數民族服裝文化的吸收，形成了「雜以戎夷之制」（《舊唐書·輿服志》）的官員服裝現象。特別是唐代，朝廷廢除了官員出外乘車的制度，要求騎馬，這樣一來，傳統的漢式服裝勢必跟不上時代的要求。所以，唐自建國始，官員在一般場合下的服裝都比較簡潔，其中



二一、回鶻衣裝回鶻馬——胡帽

《舊唐書·輿服志》在記述完唐時婦女著鞞羅和帷帽的情況之後說：「則天之後，帷帽大行，鞞羅漸息。中宗即位，宮禁寬弛，公私婦人，無復鞞羅之制。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慣矣。」這條史料，說從駕宮人戴胡帽、露髻馳騁和著丈夫衣服靴衫的情

又更多了一些胡化的東西。有人曾企圖復古，大臣劉子玄立即撰文予以批駁，他引經據典，歷數胡化服裝的優點，希望朝廷「乘馬衣冠」、「宜從省廢」（《舊唐書·輿服志》）。在朝廷官員服裝胡化的直接影響下，婦女著胡服胡帽，自然而然，不過婦女更大膽開放，基本上都是直接拿來我用，因此，當時的詩人和史學家，才把她們當做一道風景線，大加渲染。

從昭陵陵園出土的文物來看，婦女所戴胡帽的種類很多。由於歷史原因和唐代前期與西方及北方少數民族交往最為密切的現實原因，這些胡帽，大概也以西方及北方少數民族的帽子居多。由於歷史久遠，這些帽子的名稱現在已很難搞清。

圖五是出土於燕德妃墓的壁畫《女侍圖》。圖中女侍梳單螺髻，穿窄袖長衫，繫紫色長裙，手捧一頂帽子。此帽形如圓鉢，當是西方少數民族所戴的圓皮帽。這種帽子，現在都市女郎，偶也戴之。也有學者認為，這種帽子，當是唐時頗有影響的渾脫帽。唐張鷟《朝野僉記》載，初唐宰相趙國公長孫無忌以羊毛為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從文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字記載來看，渾脫帽當有毛狀東西外露，而此帽光順無毛，是渾脫帽的可能性不大。倒是昭陵陵園阿史那忠墓出土的〈牛車圖〉中的御者形象，頭戴圓形露毛之帽，可能確是渾脫帽。

圖六是出土於鄭仁泰墓（麟德元年）的女騎馬俑，圖中女俑頭戴一頂折沿帽。圖七是出土於張士貴墓的女立俑，圖中女俑戴的這種帽子，似乎是由圓鉢形帽和方披帛組成。這兩種帽子亦當是胡帽，因為在昭陵陵園出土的很多胡人俑也戴著此類帽子。這些帽子，多為婦女騎馬出行時戴用。唐詩云：「鞞前夫人帶弓箭，白馬嚙鬣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後飛翼。」活脫脫地描繪出唐代宮女胡服騎射的英姿。

圖八是出土於李貞墓（開元六年）的三彩女騎馬俑，女俑頭戴折沿帽，身穿窄袖緊身圓領右襟長袍，腳蹬小蠻靴，騎著胡馬。觀其帽子的形狀與色彩，似乎原型帽外層是皮。裏層是布帛，中當實以棉。此前漢人帽子，不見此樣，亦當是胡帽。

此種款式的帽子，源自回鶻的可能性較大。唐代開元前後的婦女，喜著回鶻裝。回鶻裝的特點是衣袖窄

小，又著棉帽。回鶻馬有現在西亞和東歐馬的特點，頭小身高，筋骨不俗。花蕊夫人〈宮詞〉云：「明朝臘日官家出，隨駕先須點內人，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詞中描寫的貴婦，和出土的這件女俑又是何等的相似！

三、著丈夫衣服靴衫——漢式男帽

唐代婦女戴漢式男帽，不惟開元以後有，從各地出土的唐代文物來看，自大唐肇建，至大唐滅亡，貫穿始終，不曾中斷。戴漢式男帽，其服裝也多為漢式男裝，間或也有穿胡服的，真可謂胡越一家，不拘一格。唐代的漢式男帽，林林總總，不下數十種。最普遍也最有代表性的是幞頭，與之相配套的服裝是袍服，上至帝王，下至士庶，莫不如此。閻立本〈太宗步輦圖〉中的唐太宗，在接見外國使者的重要場合，也是這等裝束。無獨有偶，在韋貴妃墓中，也出土了唐太宗和韋貴妃坐在一起的家居生活壁畫，畫中的唐太宗也著袍戴幞頭。

幞頭也叫折上巾，其起源於東漢，基本定型於北周。東漢梁冀改易

輿服之制，作折上巾，以全幅皂絹，裏髮向後。據說袁紹當年為曹操所敗，幅巾渡河，人遞相效仿。所謂的幅巾，即折上巾。至北周時，周武帝稍改其制，為幅巾做四條帶子，二條繫腦後而垂之，二條反繫頭上，使頂部吃緊。自北周以後，迄於有隋，幪頭即在男帽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流行程度尚不及烏紗帽。烏紗帽創自南朝宋明帝初年，建安王休仁首創，以烏紗抽紮帽邊。隋代帝王貴臣多服之，其後漸行於民間，貴賤無別。至唐初，折上巾的流行才超過了烏紗帽。

昭陵陵園出土的俑類文物和壁畫中，婦女形象而戴幪頭的非常多。圖九是出土於燕德妃墓的〈女侍圖〉壁畫，圖中女侍即戴幪頭，著袍服。圖一〇是出土於鄭仁泰墓的女立俑，圖中女俑戴幪頭，穿繡花邊胡服。

唐代婦女著漢式男袍，戴幪頭，常會使人把她們誤為男子。《唐語林》裏記載了這麼一條有趣的故事：「武宗王才人有寵。帝身長大，才人亦類。帝每從禽作樂，才人必從。常令才人與帝同裝束（一定是袍服、幪頭）。苑中射獵，帝與才人南北走馬，左右有事者，往往誤奏於才人前，帝

以為樂。」武宗為之樂，今人也忍俊不禁。



圖九



圖一〇

四、融通華夷，自創用帽——花冠與鳥形帽

唐代婦女開放豁達，表現在服飾文化方面，則是兼蓄並收，融通華夷，還自創了多種用帽。但從昭陵陵園出土的文物來看，惟花冠一種，但同時代的其他墓葬中，卻有多種發現，這裏僅選一種，以饗讀者。

花冠是用花朵裝飾起來的冠狀飾物，也可以把它歸於婦女首飾類，但它既冠以「冠」字，不妨也當作帽子來看。張說〈蘇摩遮〉詩：「繡裝帕額寶花冠，夷歌騎舞借人看。」白居易在〈長恨歌〉裏描寫楊玉環：「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可見花冠特為唐時貴婦和舞女所鍾愛。《舊唐書·音樂志》記述了多種少數民族舞女頭戴的花冠，這些花冠上飾有金玉珠貝，一曲舞罷，珠玉可掃。無論是漢族婦女還是少數民族婦女，以珠玉裝飾髮髻，俱有傳統，很難說誰先誰後。但是，毫無疑問，兄弟民族間服飾文化的相互滲透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昭陵陵園燕德妃墓出土的壁畫〈舞蹈圖〉（圖一一）和〈伴奏圖〉（圖一二）中的女伎，盡戴花

冠，顯得風姿綽約，曲有姿態。

出土於西安東郊唐金鄉縣主墓（開元十二年）的女騎馬俑（圖一三）中的女俑，頭戴一頂孔雀帽，顯得非常別緻。戴此種帽子的文物，為我國目前所僅見。依據這頂帽子與人體的比例來看，這種帽子可能由布帛做成，中實以棉，然後再在布帛上印染或刺繡圖案。圖一四反映的是這件女俑不同的側面。

以瑞禽猛獸為帽子形狀或飾物，是我國帽子文化固有的傳統。早在春秋時，就有隱士以鷓鴣為冠飾。至漢時，朝廷因為鷓鴣有「勇健鬥，死乃止」（《山海經·中山經·注》）的特點，就專為武士製作了鷓鴣冠，「加雙鷓尾，豎左右」（《後漢書·輿服志》）以象威武。至唐時，乾脆又將武官的帽子做成鷓鴣形。昭陵陵園李貞墓出土的〈武官俑〉（圖一五），即戴鷓鴣形冠。尉遲敬德墓（顯慶四年）出土的〈將軍俑〉（圖一六），又戴虎頭帽，以虎狀人，極盡威武。現在農村小兒，也常戴虎頭帽，「虎頭虎腦」，逗人喜愛。婦女愛漂亮，孔雀羽毛美麗，自然會得到婦女青睞，以其形為帽，自在情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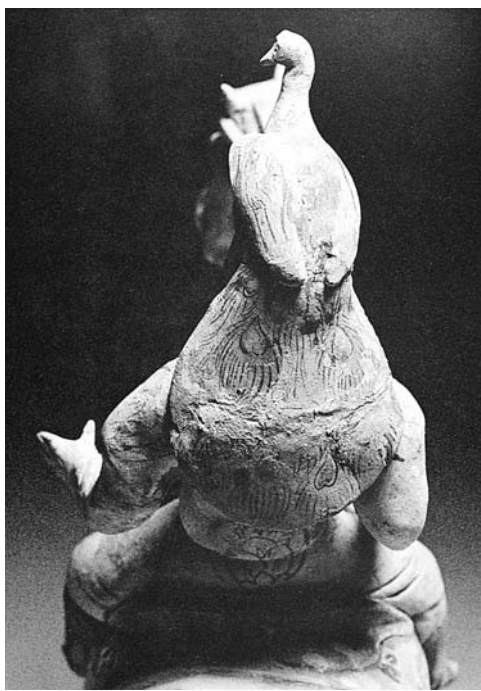
圖一一



圖一二



圖一三



圖一四-1



圖一四-2



圖一五



圖一六

唐時婦女以漂亮飛禽為帽飾或帽形，《舊唐書·音樂志》也有明確記載，其文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鵠鶴冠，作鳥像。」鵠鶴乃嶺南之鳥，唐時也叫吉了，即八哥。我們欣賞到的這件女俑，手擊細腰鼓，說明是樂俑。其以孔雀為帽形，也是受到了（鳥歌萬歲樂）的影響。

千年塵封，千年企盼。當一件件、一幅幅反映唐代婦女生活的文物破土而出，讓我們一睹芳容時，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它們所表現的唐代婦女，是那樣的鮮活與完美。相信隨著反映唐代婦女生活的文物不斷出土，我們通過它們對唐代婦女生活的研究會更加科學、深入和細緻。

